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宁党史人物传．12／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3
ISBN 978－7－205－06182－1

Ⅰ.辽… Ⅱ.辽… Ⅲ.中国共产党—人物—列传—辽宁省 Ⅳ.K820.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0882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140mm×203mm
印　　张：13.5
插　　页：8
字　　数：312千字
印　　数：1～2000
出版时间：2007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丽竹
封面设计：杨　勇
版式设计：李家兴
责任校对：吕志贵
书　　号：978－7－205－06182－1

定　　价：20.00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张学良…… 张德良(1)
巩天民 …… 王立中　王广岩(65)
张有才 …… 王　枫　阚静宇(92)
王堃骋…… 刘义轩(102)
管松涛…… 张　冠(143)
李　都…… 李香晨(170)
丁　岩…… 郑崇达(200)
王光中…… 范传尧　姜福坤　申志斌(223)
宋国祥…… 王明泉(273)
王　良…… 韩景春(293)
冯培桢…… 马春山　王旭东(331)
沈洪涛…… 江　渤(390)

# 张 学 良

张德良

张学良，历任奉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后擢升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军统帅，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职，是著名的爱国将领。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内和平和国共合作，在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威逼华北的形势下，迎来了全国抗日的局面。

## 一、从军阀大公子向青年爱国者的转化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①]。祖籍山西省洪洞县，李姓；后迁居河北省大城县，改姓张氏；原籍辽宁省海城县人。生逢战乱，母亲赵氏在从八角台（今台安县境内）逃难中将他生在大车上，养育于广宁县桑林子镇詹家窝棚（今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詹家窝棚屯）亲属赵

① 1928年6月4日（农历四月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的生日按农历计算与其父张作霖的忌日偶合，为同一天。此后张学良的生日改为公历5月31日、6月1日、6月3日不定期举行，所以张学良说“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

明德家[①]。3岁移居新民镇杏核胡同，11岁丧母。乳名双喜，后改名小六子[②]。字汉卿，别号毅庵，化名李毅，笔名曾显华。

张学良为张作霖之长子。其父张作霖当过木匠、货郎，卖过包子，学过兽医，虽曾一度落草为匪，但长期以兽医为业，中日甲午战争中参加清军，升为哨长。1901年张学良降生时，张作霖为民间地方武装“保险队”团练长。1902年在新民府受抚，成为清政府地方武装，历任游击马队管带、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参加征剿分裂祖国的蒙匪陶克陶胡、牙仟、白音大赉，作战有功。张学良的童年生活在农村环境里，且社会动荡不安，家庭不富裕，过新年时还得借件新衣裳穿，以装点门面。

张学良有兄弟8人，他的7个弟弟依次是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浚、学英、学铨；有姊妹6人，依次是冠英、怀英、怀瞳、怀卿、怀曦、怀敏。其中冠英、学良、学铭为赵氏所生，余均为同父异母所生。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1916年与其结婚。1928年在天津与赵一荻相识，后在沈阳同居，1964年与于凤至离婚后，与赵一荻在台北正式结婚。张学良与于凤至生有女儿闾瑛，儿子闾洵、闾玕、闾琪。与赵一荻

---

① 关于张学良的家乡，按其父张作霖出生地为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驾掌寺村；1975年该村改属大洼县。而张学良的出生地属广宁（今属台安）县。因此，海城、大洼、台安都是张学良的家乡。

② 张学良是张作霖继有了女儿张冠英后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又正值张作霖在同土匪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故给他取乳名“双喜”。双喜小时身体不好，怕不好养活，其父母到庙上许愿，并按照庙上的规矩让双喜“跳墙”（实际是个桌子），意即身体坏的双喜留给庙上“出家”了，跳过墙的是获得新生的双喜，要改成新的乳名，其新名即是在大街上第一次听到别的大人叫自己孩子的名字。恰好有人呼唤自己的孩子“小六子”，由此双喜改称“小六子”。

生有一子闾琳。闾琳夫人陈英，生有二子居信、居仰。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没有进过正规学校。6岁时父张作霖特聘台安秀才崔名耀至新民府，任家庭塾师，为其开蒙。1912年，随父进入奉天（今沈阳）省城，在家设专馆，13岁、14岁从师金梁学文，聘海城老儒杨景镇和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白永贞任教。1915年，从师徐启东学英语，从师陈英学法语。1916年，又结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亦师亦友。所有这些为张学良奠定了文学、历史、书法、外语及外域知识的坚实基础。张学良少年时代虽然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但博闻强记，聪明过人，接受教育很快。他所受教育及影响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其中受西方师友较之中国师友的影响更深，加之眼见身受强邻日俄两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促成了张学良反帝爱国思想的萌发。

1912年，张作霖任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已由清朝地方部队的下级军官变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正规军的高级将领了。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东北地区的军政大权，是为奉系军阀的发轫和形成时期。随着张作霖的发迹，家世显赫起来，张学良变成了军阀大公子[①]。1915年，在奉天张学良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运动。这是张学良从事反帝爱国事业的起点。张学良说："及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

① 时人称之为两大公子（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或四大公子（外加段祺瑞之子段鸿烈、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或五大公子（外加张謇之子张效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①] 爱国储蓄运动是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组成部分。张学良先是于 1915 年参加奉天救国储金会，并经手募集了一批股款，以其范围狭小而停止。复于 1917 年与友人共同发起奉天储蓄接济会。1918 年 2 月 20 日正式成立，更名为奉天储蓄总会，任名誉会长。该会宗旨为接济贫民，贷款给商民，发展地方经济，挽回利权，免受帝国主义高利贷剥削[②]。1916 年，张学良还走上街头，参加赈济河北水灾灾民的义卖。身为军阀大公子的张学良为救灾民而奔波。“他身着紫衣玄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③]。张学良人生征途是从实业救国起步，财经生涯开端的，并且一开始就带有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色彩。

张学良到奉天后，1915 年参加摩登俱乐部，他是唯一的中国人，余均为外国人，1916 年，他又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会董。从此他开始了与西方人的交往。他多次谈到青年会在他成长中的意义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青年会之助力。”同年 11 月，年仅 16 岁的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听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来奉天的讲演，竟使他终生难忘，给张学良的思想打下了极深的烙印，并称张伯苓是他的老师。他常常忆起这段往事。1930 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回忆说：“予幼年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有‘中

① 天津《大公报》，1926 年 11 月 21 日。

② 张学良：《致邹子方函》及附件，兴城县公署档，辽宁省档案馆藏。

③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南粤出版社，第 13—14 页

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努力救国'。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①] 张学良从此坚定地树立起了"立誓救中国"的人生观，即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人生观。

张学良十五六岁步入社会，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转折点。他从思想到行动，开始由军阀大公子，向青年爱国者转化着。这个转化不仅在政治上对反帝爱国事业，一扫悲观心态，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抛弃了嫖赌的放荡行为。1991 年 5 月 11 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对青少年时代作了如下的追述：

"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自我表白，既然你问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爱国狂。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我起来完全仗着我的父亲的环境和权势，我想到人家走两步，我走一步就到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我的决心。从事内战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同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②]张学良对来自外界的好评，他只接受"爱国者"的赞誉，他多次自我剖白青年时代是一个"爱国狂"。张学良 1921 年秋赴日本观秋操。访日期间虽然受到日本官方的优待，但对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日本总想以势压人，向他炫耀武力，张学良不但没有害怕，反倒引起反感。他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人。

---

① 天津《大公报》，1930 年 12 月 11 日。

② 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 20 页、第 32—33 页。

归国途中，陪同前往的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本庄繁问张学良："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来反日最力呢？'张学良回答说："就因为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①]张学良从此领悟到一条真理：日本人这种民族优越感，实为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访日归来他建议奉军应实行军事现代化，为其父张作霖所采纳。

1923年全国各地爆发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②]。张学良同情学生运动，对北京学生和市民"打倒军阀"、"收回旅大"运动，在道义上和物资上给予公开支持。他拿出自己的工薪100元捐给"三二"惨案受伤学生做医药费，还写了一封慰问信登在报上。信中说："各国军警对于学生们的示威运动，只有在旁维持秩序，没有听说军警和学生冲突的。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国家外患的责任，但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施加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青年学生们能手无寸铁地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不能使国民得永久安宁。""我曾经因此告诫我的部属，希望他们以后不致效尤。"[③] 这封信把拥护学生反帝反军阀爱国爱民的思想表达得颇为明白透彻。

---

① 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10日。

② 1898年3月27日，沙俄政府胁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大25年。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竟将旅大的租借权转给日本。按照原条约，到1923年3月26日租借期满，应将旅大归还中国，但日本借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拒不交还，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1923年3月2日由北京青年学生先行开展的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游行中，遭到军警镇压酿成惨案。其后，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掀起了以收回旅大为主要内容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热潮。

③ 《盛京时报》，1923年3月18日。

1925 年爆发了全国范围内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时任军长的张学良对待英日帝国主义军警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如同对待“三二”惨案一样，捐助自己的工薪 2000 元，抚恤上海死伤的学生，并发出致全国学生会慰问电。6 月 10 日，奉命率奉军军士教导队赴上海，任务是调查五卅惨案真相，派兵保护中国居民，维持秩序，校阅军队。同日，亲往上海各医院慰问受伤工人、学生 21 人，赠每人医药费 50 元。同时允许参加五卅运动的学生代表赴奉军中讲演，以亲见亲闻激发军人爱国之心。更值得称颂的是他在上海接见华侨学生会代表时说：“至带兵一事，因在津闻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①]可见，张学良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爱民军人的英雄气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英、美、日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英帝国主义制造了 1927 年 1 月 3 日的汉口惨案，1 月 6 日的九江惨案，合称“汉浔惨案”。3 月 26 日又发生了英、美炮轰南京事件。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面前，张学良于 1927 年 1 月 12 日就汉浔事件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一致反对英帝国主义[②]。4 月 5 日就南京事件致电蒋介石等南军将领，再次表示，我国内变属阋墙之争，胜败得失，皆一家之事，因此主张“同是国人，一致对外”[③]。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出兵山东，制造了屠杀中

① 《晨报》，1925 年 6 月 16 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27 年 1 月 13 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27 年 4 月 8 日。

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张学良于5月9日、10日、11日三日内鉴于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的教训，反复表示“南北一家，息争救国”的强烈愿望。及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日子里，已明确提出“对外打倒帝国主义”[①]的政治主张。

## 二、力主东北易帜，实现和平统一

张学良原本志愿学医，可是奉父命于1919年5月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亦师亦友，情谊甚笃，扎下了军事学的根基，且成绩名列前茅，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跻身于奉系军阀行列，出任高级军事指挥官。张学良幽默地说：“我本来想学医救人，没学成，却学军，反而学会了杀人。”依靠父荫和父执张作相的提拔，主要是自身的努力，1919年12月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1920年6月升任该旅旅长，亦称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长。同年11月授陆军少将衔，成了年仅20岁的“青年将军”。时人誉之为“北方之曙光”、“北方之子”；然军中亦有尊为“少帅”者，不料张本人“耻为少帅”[②]，以示父子不同。从1920年至1931年的12年间，他参加过11次战争，其10次是内战：吉林剿匪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平定郭松龄反奉战争，对抗北伐军的南口、河南、涿州三次战役，蒋桂阎冯对奉军之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讨伐石友三战争等。但是从他参加军阀混战、参加内战之时起，就开始萌生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反对

① 天津《大公报》，1931年4月24日。

② 《北洋画报》第103期，1927年7月13日。

内战，力主对帝国主义进行反侵略战争，力主和平统一祖国，力主和平建设祖国的思想。

当然，张学良早期参加内战参加军阀混战是奉父命的违心之举，兼之他参政并未主政，因此，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根据确凿的史实，说明张学良在10余次内战或军阀混战中，每一次都曾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尽心竭力。

他自己讲，“从19岁开始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①]。这是指1920年冬他指挥吉林剿匪战争，一反“阙（朝玺）大刀”政策，改用“剿抚并重”政策说的[②]。曾剿灭袭破在珲春杀死日本副领事惹起外交问题的大股土匪“占中华”等2000余人；收抚江东一股土匪1000余人，改编为山林警备队，由张学良兼代总队长。这是张学良实地参加战争的开始，也是和战并用的序幕。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学良出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三梯队司令兼奉天陆军第三旅旅长。当奉败直胜大局初定之时，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奉军三、八旅，在6月8日至13日的山海关之战，打退了直军追击，守住了山海关大门，显示了张学良的军事指挥才能。但转败为胜的张学良却认为这种内战是毫无意义的，他下决心要使内战停下来，使那些无知的士兵参加建设工作。为此，他曾拜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恳求他去山海关前线调停直奉战争，促成直奉和谈。张学良也来到秦皇岛前线出任奉军和谈代表。在英国医生、奉天医科大学讲师兼盛京施医院院长杨古·德康脱尔和美

① 《团结报》，1991年10月2日。

② 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传教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平主义者普赖德为居间人的停战建议下，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限，19日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一部驻防山海关外，大部撤回原防[①]。秦皇岛谈判的成功，在张学良反对军阀混战，和平统一祖国的征程上，可算是首开纪录。

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指挥作战。战前和其他军长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歃血为盟，相约不要地盘，只掌军权[②]。但到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办，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不占地盘的誓约他们并未遵守。唯郭松龄未争地盘，但功高不赏，对张学良亦有烦言。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在九门口、石门寨之战，再次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奉胜直败。第二次直奉战后，奉军达到了鼎盛时期，占据奉、吉、黑、热、直、豫、鲁、苏、皖9省，成了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中的最大一派。1924年12月，张作霖通过与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皖系段祺瑞的合作，部分地控制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北京中央政权。奉军人数也由17万上升至35万人之众。然而恰在奉军以胜利之师声威大震之时，张学良反对军阀、反对军阀混战、力谋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日渐浓烈。1924年12月初，他对北京大学师生们说："中国人向痛诟军

① 《传记文学》，第62期，第5页。

② 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页。

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此时并非怯于对外，实际上实不得不慎重考虑。学良军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他公开表示自己“决不愿为军阀”[①]。

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还实行了第一次国奉合作，也叫做“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曹（锟）吴（佩孚）”三角联盟，张学良与孙中山结下了世谊。国奉合作期间双方信使往返频繁，书信传递多次，有过对孙中山财政、军事援助，孙中山和张作霖在天津直接会过面。这期间，张学良不仅襄助父亲联系国奉合作事宜，接待使者，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他与乃父张作霖政见不一致，对国事有其独立见解，与孙中山有直接书信联系。1922 年秋，韩麟春去广州见孙中山捎去张学良手书一封，现在虽然还没找到原件，但从 1922 年 9 月 22 日孙中山复信中可略知一二。复信中说，关于反曹吴国奉双方在军事上的战略配合问题：孙中山国民党在南方先出兵与曹吴对峙，时机成熟，奉军再出兵关内，直捣北京曹吴老巢，一举推翻曹吴统治，即孙中山复信中所夸奖的张学良“所论奉省持静观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孙中山说了南北夹击方案之后又说：“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孙中山的复信还对“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的做法表达了欣慰之情[②]。1923 年，孙中山派叶恭绰使奉，张学良因公外出未能相遇，遂于次年一月复函一札。这封信讲了

① 《晨报》，1924 年 12 月 2 日。

② 孙中山为汪兆铭就商讨伐曹吴复张学良函，《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815 页。

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表达了张学良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孙中山为当代人豪，世所共仰。"二是披露了张作霖拟"退让权利"，服从孙中山，以实现国奉合作。信中说："家君钦服之余，辄有景行行止之叹，权利已早拟退让矣，宁能言此而相争也！合作精神，愿各推诚作去，则大局幸甚！"[①]这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第一次让权，希望实现国奉合作。张作霖是国奉合作的倡导者，张学良是国奉合作的襄助者。所以张学良说：早于1923年，即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决定了东北易帜[②]。孙中山北上，于1924年12月4日到天津，31日到北京。此间张学良于平津两地晋谒孙中山，亲聆教诲，受益良深。他在武汉时期的两次讲演中回忆说："十多年前，本人曾在天津张园，晋谒总理，对于当时的国势和未来的展望，告诫殊殷，使我感觉到总理对于时事的认识，极为透彻。"[③] 又说："我记得当年在北京时，曾晋谒总理一次。见面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寒暄，他只问我两句话：'日本在东北的一切设施如何？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当时使我很感动。"[④] 孙中山为张学良手书"天下为公"横幅赠之，且称"汉卿世兄"，以示世谊[⑤]。

1925年4月，张学良升任陆军中将，5月出任东三省陆军

---

① 张学良为来奉未遇复叶恭绰函，1924年1月8日，《张学良进关秘录》，第338页。

② 张学良与日记者团谈话，《新民晚报》，1929年2月6日。

③ 《在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1935年3月12日），《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④ 《总理诞辰纪念会讲演词》（1934年11月12日），《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⑤ 《北洋画报》，1926年9月15日。

训练处副监，9月任镇威军京榆驻军司令兼东北陆军第四师师长，10月任镇威军第三军团军团长，11月任讨逆军前敌总指挥兼中央军司令，12月任镇威军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1926年3月任镇威军第三方面集团军司令。

1926年7月，在广州国民政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号召下，国民革命军总正式出师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的三大派：直系吴佩孚、皖系孙传芳、奉系张作霖。张、吴、孙在“一致讨赤”口号下对抗北伐军。国共合作的北伐所向无敌，攻入长沙，占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早在1924年10月，原直系军阀之一部冯玉祥赞同国民革命，举行北京政变，脱离直军，将所部改为国民军。1925年9月开始进攻宁陕，与北伐军南北呼应。1925年11月，奉军中之一部郭松龄，与冯玉祥合作，改称东北国民军，于滦州倒戈反奉。

1925年12月，东北国民军郭松龄反奉战争初期起，张学良在《复郭松龄函》中提出停止军事政治和解的方针①。战胜郭松龄之后，张学良看到的是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疾苦。1926年8月，南口战役对冯玉祥国民军获胜之后，张学良看到的仍是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因此他反对为内战获胜的南口战役开大会庆功祝捷，他认为“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②，并于1926年9月17日第一次正式提出“早息内争，共御外侮”

① 《申报》，1925年12月7日。

② 《晨报》，1926年8月22日。同根相煎源于《三国·魏·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比喻兄弟争斗，泛指斗争。

和平统一祖国的完整政治主张[①]。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对抗北伐战争过程中，于1926年11月联合北洋军阀各派，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又于1927年6月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张作霖已成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末代元首。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代替北京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并同武汉的革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相对抗。其后武汉政府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宁汉合流”、“国共分裂”而告终结。

1927年2月，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6月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授陆军上将衔。2月8日，张学良奉父命出师河南对抗武汉的革命国民政府北伐军。于是出现了奉军对抗北伐军的河南战役。河南战役中，张学良于3月22日在对抗北伐军的前线，违背父意，与副军团长韩麟春联名公开发表《对时局通电》，继续主张“息争御外”[②]。在行动上，在出师河南途中，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蠲除虐政，豁免苛征；弃郑州，撤兵河北，不烧粮库，不炸火药库，不炸黄河大铁桥；亲赴彰德，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代表何成浚谈判，以示第二次国奉合作的诚意。可惜，这次“首倡弭兵，事与愿违，有志未遂”[③]。但张学良却成了北伐战争中北

---

① 张学良：《与国闻社记者谈时局》，天津《大公报》1926年9月19日。“早息内争，共御外侮”，又叫“息内争，御外侮”简称“息争御外”，意即早日把军阀混战或“剿共”内战停息下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源于《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阋于墙”指内争，“务”通侮。

② 天津《大公报》，1927年3月13日。

③ 天津《大公报》，1928年7月4日。

洋军阀方面第一个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反帝爱国将领，并为即将到来的东北易帜做了前期准备。

河南战役，张学良不仅继续倡导和实行“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而且在思想上完成了反军阀反内战求和平求建设的人生观的第二次转变。他说：“予以前服从先严命令，数次打仗皆受兵灾之影响。而东三省为兵所耗，不下万万，若以办理建设事宜，岂可限量。奉军三次入关，最盛时曾达及江南，然而效果何在？予纵观古今，未见可以全用兵力谋建设者。”① 他又说：“余以为中国目前所最需要者莫过于和平。余于19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于战争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余曾因战事至马牧集（今河南虞城），下车后，至附近加以视察，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面黄肌瘦，呻吟憔悴，痛苦不堪言状。姑询之，则均谓家中壮丁均被拉夫，田产房舍又被军队占领，于是余之内心即感觉万分痛苦。盖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者，全因军人之压迫，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者，又因战事之发生，故内战为罪恶之母。于是余之人生观即从此改变。且作战不择手段，不论方法，只以争得最后胜利为目的，故作战时只知破坏，专事残杀，受害者人民而已。在作战时之将士莫不以抛头颅溅热血为无上光荣，殊不知男儿不协力对外，为国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其实内争之肇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② 张学良这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对自己8年戎马生涯和奉系军阀三次入关逐鹿中原，以及民国近20年来中国内战的总清算。在爱国爱民的基点上，他已把痛恶军阀、痛恶军阀割据，痛恶军

① 《新民晚报》，1928年12月27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